

老挝语言政策历时研究



杨洋¹, 晏丽², 胡蓉^{2,*}

¹ 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现代语言与传媒学院, 马来西亚吉隆坡 43400

² 普洱学院外国语学院, 云南普洱 665000

摘要: 本文旨在研究老挝不同历史时期的语言政策: 澜沧王国和暹罗属国时期、法国殖民时期、君主制国家时期和社会主义国家时期。基于 Lo Bianco 和 Aliani 提出的研究语言政策的“文件”、“话语”和“实践”三维模型, 通过梳理老挝各时期阐述语言使用立场的政策文件、对于政策文件解读的文献资料和对语言实际使用情况的分析, 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澜沧王国和暹罗属国时期, 原始老挝语与中国南方历史上的百越民族的越语相近。暹罗对老挝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统治造成了当今老挝语和泰语高度相似的现象。法国殖民时期, 殖民当局在老挝实行语言同化、规范化和去暹罗化的语言政策。君主制国家时期, 老挝王国的语言政策属于过渡时期, 王室基本延续了法国殖民时期“老挝语言文字委员会”制定的语言教育政策和老挝语拼写规则, 将老挝语通过宪法形式确立为官方语言。社会主义国家时期,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实行将老挝语作为国家官方语言、通用语言、教学语言的单语制语言政策。尽管单语制语言政策意在培养老挝民族意识、构建国家认同, 但这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其他少数民族的反对。随后, 在完成上述历史使命的同时, 老挝政府对单语制政策逐步改良, 调整少数民族语言政策, 推行多语并存的语言政策。

关键词: 老挝; 老挝语; 语言政策; 单语制; 多语并存

DOI: 10.57237/j.cll.2023.02.002

A Diachronic Study on Language Policy of Laos

Yang Yang¹, Li Yan², Rong Hu^{2,*}

¹ Faculty of Modern Languages and Communication, Universiti Putra Malaysia, Kuala Lumpur 43400, Malaysia

²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Pu'er University, Pu'er 665000, China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examine the language policies of Laos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the Kingdom of Lan Xang and the vassal state of Siam, the French colonial period, the monarchical period, and the socialist period. Based on the three-dimensional model of language policy research proposed by Lo Bianco and Aliani, "Text", "Discourse", and "Practice", through analyzing the Lao policy documents that state the position of language use in different periods, unscrambling the literature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policy documents, and investigating the actual use of language,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are drawn: during the period of Kingdom of Lan Xang and the vassal state of Siam, the original Lao was similar to the Yue language spoken by the Baiyue people in the history of southern China. The Lao script is alphabetic writing created from Sanskrit and Pali. More than a century of Siamese rule over Laos resulted in a high degree of similarity between the Lao and Thai languages today. During the French colonial period, the Language policy of assimilation, standardization, and "de-Siamization" was implemented in Laos. In the meantime, French had been the official language, working language, and instruction language, while Lao was an optional subject in

基金项目: 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汉语教育与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以老挝为例”(2020J0716).

*通信作者: 胡蓉, rong_hu0206@163.com

收稿日期: 2023-03-13; 接受日期: 2023-04-10; 在线出版日期: 2023-04-25

<http://www.chlanglit.com>

the education system. During the monarchical period, it was a transitional period in terms of language policy in the Kingdom of Laos. The Royalist Government of Laos continued the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ies and spelling rules of Lao formulated by the “Comité Littéraire” of French colonial authorities and established Lao as the official language in the Constitution. During the socialist period, the government of the Lao People’s Democratic Republic adopted the language policy of monolingualism by taking Lao as the official language, national language, and instruction language. The monolingual policy aroused opposition from other ethnic minorities, but it played a role in cultivating Lao national consciousness and constructing a national identity for an emerging multi-ethnic country. While fulfilling this historic mission, the Lao government has gradually improved the monolingual policy, adjusted the policy of minority languages, and implemented the policy of the coexistence of multiple languages.

Keywords: Laos; Lao; Language Policy; Monolingualism; Coexistence of Multiple Languages

1 引言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Lao People’s Democratic Republic），简称老挝，与中国云南省接壤，是陆路连接中国与东盟路程最短的国家。它是东南亚唯一一个没有出海口的国家，一直有一个由“陆锁国”变为“陆联国”的梦想。老挝希望借鉴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经验，因此，其充分理解、接受和认同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的理念和价值观[1]。“一带一路”不仅需要语言铺路[2]，更需要相关学术研究和理论支撑。研究老挝语言政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两国合作。

老挝语和汉语同属于汉藏语系[3]。同时，老挝和中国一样同属于社会主义国家和多民族国家。研究老挝语言政策能够给中国的语言政策制定和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带来一定的启示作用[4]。

2 老挝概况

老挝是一个位于中南半岛北部的内陆国家，北与中国云南省接壤，南临柬埔寨，东望越南，西濒泰国、缅甸。老挝历史上曾是真腊王国的一部分。老挝于1997年加入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也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

2.1 历史简介

关于老挝历史上的原住民说法不一。据中国史书记载，1-12世纪老挝土地上的主要住民是孟-吉蔑人，其中较为强盛的一支建立了堂明国[5]。老挝历史上首个统一王国是由法昂（Fa Ngum）于1354年建立的澜

沧王国（Kingdom of Lan Xang）¹ [6]，首都为琅勃拉邦。澜沧王国代表着老挝历史上的鼎盛时期，直到1707年因王位继承纷争而分裂为琅勃拉邦王国、占巴塞王国和万象王国，后因外部势力入侵，国力逐渐衰落。老挝1779年沦为暹罗（今泰国）属国，受其控制[6]。1893年法国以武力迫使暹罗与其签署《法暹曼谷条约》，把老挝并入法属印度支那联邦（Indochine française），自此老挝沦为法国殖民地[7]。1954年，法国撤出老挝，老挝王国独立，建立君主立宪制国家，在日内瓦会议上得到了国际承认。然而，独立后的老挝随即陷入了内战，由美国、泰国支持的王室和由苏联、越南支持的巴特寮（Pathet Laos；老挝民族统一战线）争夺国家统治权[8]。直至1975年，共产主义组织巴特寮统一全国，建立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2.2 民族构成

老挝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民族识别和划分标准。1893年，老挝沦为法国保护国。法属时期的资料称老挝的主体民族为“佬”（自由人），即当今的佬龙族。称其他少数民族为“佻”（kha），即“奴隶”、“奴仆”[9, 10]。1968年，老挝革命政权将老挝各民族划分为三个系统、68个部族，即佬龙系统10个部族、佬听系统43个部族和佬松系统15个部族[11]。1985年，老挝民族研究工作者将老挝的民族重新划分为47个，1995年的老挝全国人口普查中亦是使用该民族划分方法[12]。2000年，老挝中央建国阵线经讨论将老挝民族划分为49个民族，分属四个族群：佬-泰族群、孟-高棉

¹澜沧王国，有的文献称作“兰沧王国”。

族群、汉-藏族群和苗-瑶族群。这种民族划分方法在 2005 年和 2015 年的人口普查中得到使用并沿用至今。下表展示 2015 年人口普查中 49 个民族中人口多于全国总人口 1% 的九个民族和其他民族人口所占比例分布[12]:

表 1 老挝各主要民族人口比例分布

民族	人口	比例
佬 (Lao)	3,427,665	53.2%
克木 (Khmu)	708,412	11.0%
苗 (Hmong)	595,028	9.2%
普泰 (Phouthay)	218,108	3.4%
泰 (Tai)	201,576	3.1%
玛龚 (Makong)	163,285	2.5%
卡当 (Katang)	144,255	2.2%
傣 (Lue)	126,229	2.0%
阿卡 (Akha)	112,979	1.8%
其他 40 个民族	749,153	11.6%
合计	5,621,982	100%

2.3 语言现状

老挝的官方语言是老挝语 (Lao)，但全国仅有约半数人口会讲老挝语。老挝语是佬族的母语，在语言谱系分类中属于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壮傣语支。老挝语是一种以老挝语字母为书写体系的声调语言，其字母和泰语字母相近[13]，在高棉语字母 (Khmer script) 的基础上产生于 13 至 14 世纪。受宗教影响，老挝语文字老挝文是以巴利文 (Pali) 和梵文 (Sanskrit) 为基础逐渐发展而来的。由于现代老挝语受泰语的影响，大量词汇来自于泰语，能够阅读泰语的人基本能读懂老挝语。除佬族讲老挝语以外，其他少数民族基本使用其民族语言。其中，克木族母语克木语 (Khmu) 和苗族母语苗语 (Hmong) 是主要的少数民族语言。

由于老挝历史上受法国殖民，法语至今仍在政治和商贸领域得到广泛使用。全国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学生接受法语授课。此外，法语也是其他非法语授课学生的必修课程。全国各地指示牌均以老挝语、法语双语标示。除法语外，英语作为东盟国家交流语言，近年来也逐渐成为较多人口学习的外语。

3 理论框架

Lo Bianco 和 Aliani 于 2013 年提出了研究语言政

策的三个维度：文件、话语和实践 (text, discourse, and practice) [14]。他们在其专著中对该模型使用了不同的术语：专著副标题用了“意图、修辞和实施” (intention, rhetoric, and implementation) 三个词；文内小标题分别用了“文件、辩论和行为” (text, debate, and behavior) 和“意图、诠释和实施” (intention, interpret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等术语。Meyers [15] 对 Lo Bianco 和 Aliani 提出的语言政策三维度进行了总结，归纳出“文件、话语和实践”三个术语。

“文件”是指明确阐述语言使用立场的实际政策文件，如《宪法》《教育法》《语言文字法》“国家发展规划”等法律、法规文件。“文件”代表着语言政策实施的目的和意图。

“话语”所涵盖的内容较为丰富，它指的是对政策的解释，比如负责政策设计、制定、执行等的官员如何看待政策；或是对于政策文件解读的文献资料等；以及语言规划行政部门、各级教育管理部门、语言教师、语言学习者等语言政策利益相关方对政策的支持或反对态度、及由此所产生的“公众讨论、民间团体话语和公民宣传” (public debates, civil society discourse, and citizen advocacy) [14]。这些讨论或话语又包括“解释和改进、确认或修改、否定或颠覆” (interpretation and refinement, confirmation or modification, repudiation or subversion) 等几种状态[14]。Lo Bianco 和 Aliani 认为以往的语言政策研究过于依赖“文件”部分，“话语”部分往往很容易被忽略，而“话语”部分对语言政策研究颇为重要，尤其是当公众讨论或行动与“文件”意图不一致时。

仅仅将官方文件作为语言政策的全部会使教师和行政人员沦为外部计划的执行者，而将讨论和话语纳入到语言政策研究中还是不够全面，因为语言政策也体现在个人和群体的实际交际中。教师作为语言政策的执行者、语言学习者作为语言政策的主体和对象、再加上家长和社区成员，这些都是语言政策实施的关键群体。他们的语言选择和对语言政策的态度形成了一个复杂的交际生态系统，这些都是研究语言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实际的语言使用并不一定和顶层语言政策完全相符，“实践”则指的是实际发生的事情，通过对官修历史、地方志、前人日记等所反映出的实际语言使用来分析顶层语言政策，或是对当代语言使用进行调查、观察来详实记录语言的使用和顶层政策间的异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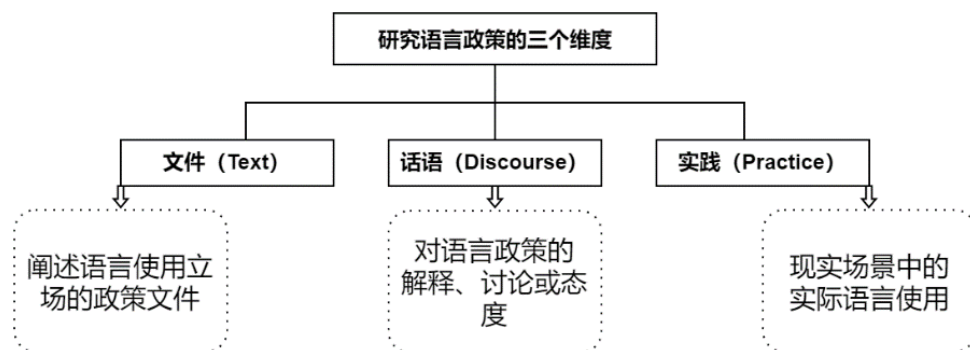


图1 研究语言政策的三维度模型[14]

本文基于 Lo Bianco 和 Aliani 语言政策研究三个维度的理论，分析老挝不同历史时期的《宪法》《教育法》《发展规划》等文件，梳理了老挝语言政策的相关文献，对老挝不同时期的宏观、微观语言政策、语言使用进行了解读。

4 老挝各历史阶段语言政策

4.1 澜沧王国和暹罗属国时期 (1354-1893)

多数学者认为，老挝的主体民族佬族源于中国南方历史上的百越民族。原始老挝语可能与当时百越民族的越语相近[16]。老挝历来是一个以佛教为主要宗教信仰的国家。由于受印度佛教的影响，在公元 10 世纪左右，老挝在梵文文字的基础上为当时的语言创造了一种拼音文字：老挝文。在澜沧王国时期，小乘佛教得到了王室的高度重视[17]，而当时的小乘佛教主要以巴利语、巴利文作为传播语言，所以在澜沧王国时期，国内同时存在两种文字：僧侣在宗教场所使用的源于巴利文的经书文字和官方、民间普遍使用的源于梵文的世俗文字[4]。

1779 年老挝沦为暹罗属国后，老挝人被迫学习泰语，在此期间，大量泰语词汇进入老挝语。暹罗对老挝长达约一个世纪的统治导致了如今老挝语和泰语非常接近的局面。尽管如此，19 世纪法国的殖民扩张也一定程度上对老挝语的独立性起到了作用。对于在西侧扩张的暹罗来说，强调老挝语和泰语之间的共性，并强调以巴利语和梵语为基础的书面语言是具有战略意义的；而对于在东侧扩张法属印度支那联邦的法国，其更加强调老挝文化和语言的独特性[18]，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老挝语的独立性。

4.2 法国殖民时期 (1893-1954)

法国于 19 世纪中叶开始在中南半岛进行殖民扩张。1887 年，法国占领越南和柬埔寨，并将其统一起来建立法属印度支那联邦。1893 年，法国从暹罗手中夺取老挝，将其并入印支联邦，从此开始了对老挝的殖民统治。除了地理、自然开发、征收赋税外，传播法语和法国文化是法国印支联邦的重要殖民理念之一[19, 20]。

殖民统治期间，法国当局在老挝实施了推广法语、弱化老挝语的语言政策。法国殖民当局规定法语为官方语言，行政文件以法语形式颁布。此外，在中小学开设法语课程，而将老挝语作为选修课程。为了方便殖民统治，法国传教士夸兹 (J. Huisi) 于 1904 年在《法暹词典》的基础上编纂了《老法词典》[21]。该词典对法语在老挝的推广起到了重要作用。

尽管法国在老挝殖民期间推广法语、弱化老挝语，为了减轻老挝受暹罗宗教、文化影响，弱化老挝与暹罗的联系，法国殖民当局同时也重视老挝语的标准化和规范化[22]。1917 年，殖民当局组织专门委员会为老挝学校编写教材，开启了标准化老挝语的进程[7, 17]。1931 年，法国殖民当局在万象设立尚塔博伊佛教研究委员会 (Chantabouly Buddhist Institute)，旨在整理老挝语字母、进一步标准化老挝语书写体系[7]。1932 年，委员会通过决议规定老挝语字母尽量使用古代石碑上出现过的字母，不足的字母从经书文字中补充[16]。1935 年，该委员会编写出版了《老挝语语法》(Grammaire Laotienne)，该语法书中仍然使用基于梵文和巴利文的书写体系，语法体系也较为复杂，所以并没有得到法国殖民当局的赞同，也没有在广大老挝人中推广开来。

1938 年，法国殖民当局责令修改老挝语拼写体系[23]。经过讨论，1939 年，当局规定去除老挝语中来自

梵文和巴利文的词汇, 改为较为简便的以发音为基础的拼写方式[24], 同时规定老挝语为国语 (national language)、法语为官方语言 (official language) [22]。然而, 这种简化的拼写体系也没有被老挝人所接受而固定下来, 仍然存在同时期不同地区使用不同书写体系的现象。20 世纪 40 年代初期, 法国当局再次发起老挝语标准化运动, 但其目的并非发展老挝语, 而是在运动中教授法语、传播法国思想体系。1917 年至 1939 年间, 法殖民当局在老挝创办多所基础教育学校, 使用法语教学。二战结束前老挝唯一的一所高等学校也是使用法式课程体系[22]。

1941 年, 法殖民当局扶植琅勃拉邦国王统治整个老挝王国, 形成傀儡政权。1947 年《老挝王国宪法》(Constitution of the Kingdom of Laos) 颁布, 其中规定老挝语为国语、法语为官方语言, 这就从国家宪法的高度确立了法语在老挝的地位, 使得老挝人不得不学习法语。1948 年, 根据王室 67 号法令成立的“老挝语言文字委员会”(Comité Littéraire) 补充完善了老挝语的辅音字母。1949 年, 老挝政府再次颁布法令删除老挝语中存在的梵文、巴利文衍生词汇, 并按照老挝语读音规范书写方式。这两条法令进一步规范了老挝语的词汇和拼写体系, 但也没能被广泛接受, 在当时部分宗教和官方文件中仍使用基于词源的书写体系。

法国殖民统治期间, 老挝语吸收了一些法语词, 比如“汽车”“钢琴”“啤酒”“阿司匹林”等。其中, 1940 年至 1945 年, 日本控制老挝, 一些日语词汇也进入到老挝语中[16]。

4.3 君主制国家时期 (1954-1975)

1954 年法国在奠边府战役中战败, 随后撤出老挝并承认老挝独立。独立后的老挝陷入了巴特寮与美国支持的王室政府之间的内战当中。此间, 尽管法语依然是基础教育中的科目之一, 其地位遭到一定程度的削弱。《1957 年老挝王国宪法》第 6 条规定“老挝语为官方语言”[25]。《1962 年教育法令》(The Education Decree of 1962) 第 3 条规定少数民族地区可以使用少数民族语言作为教学语言; 第 36 条指出入学考试中法语成绩不及格并不会导致入学失败。Enfield 认为《1962 年教育法令》是老挝历史上第一部同时强调老挝作为国语并促进少数民族语言的教育政策文件[26]。

美国对老挝教育的支持进一步促进了老挝语的普及。1965 年, 美国国际开发署 (USAID; 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通过“法昂高中”(Fa Ngum High Schools) 工程在老挝首次引入了老挝语版本的课程大纲和配套教材, 这套教材一直使用到 1975 年老挝政府更替[27]。1972 年, 在亚洲基金会和美国国际开发署的支持下, 老挝将法语版的国家法律法规文件翻译成老挝语。老挝皇家学会 (Royal Lao Academy) 进一步推动扩大了老挝语在全国的使用范围。1972 年皇家学会修订了《老挝语语法》。这版语法增加了基于老挝语的词汇并且删减了一部分巴利文和梵文术语。短短三年后政府更替, 皇家学会关闭, 该版语法也遭抛弃。此外, 在美国的支持下, 老挝王国政府还制定了一系列推广英语的政策和法规。

内战期间, 巴特寮控制的“解放区”(liberated zone) 也提供以老挝语为教学语言的基础教育。其部分所用教材为巴特寮教育部开发的老挝语教材, 部分将越南教材翻译成老挝语使用。此外, 巴特寮政府还对老挝语删繁就简, 使其拼写与实际读音更为一致, 并在解放区开展了一系列老挝语扫盲运动[28]。同时, 巴特寮政府中央领导人之一富米·冯维希 (Phoummi Vongvachit) 于 1967 年编写了新版《老挝语语法》, 对老挝语言文字进行了详尽的解释和总结, 进一步强调了基于读音的拼写规则, 为现代老挝语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2]。同年, 巴特寮还在解放区引入了苗语 (Hmong) 和克木语 (Kmu) 教材。

4.4 社会主义国家时期 (1975-)

1975 年 12 月, 巴特寮取得内战胜利, 老挝国王宣布退位。自此, 老挝废除君主制, 进入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共和国时期。共和国政府对于老挝语言文字的改革延续了之前巴特寮在解放区编写 1967 年《老挝语语法》的原则: 一是简化老挝语的拼写, 进一步去除语言中存在的泰语、巴利文、梵文元素, 促进老挝语的独特性; 二是出于扫盲需要强调语言的易学性, 使不讲老挝语的少数民族群体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也能轻松学习老挝语。

1991 年,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宪法》通过, 规定老挝语和老挝文为国家官方通用语言和文字, 这就从宪法的高度确立了老挝单语制的语言政策。2003 年修订版宪法亦保持了老挝语作为国家官方语言和通用语言的地位。2000 年, 老挝颁布《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教育法》, 并于 2007 年修订。修订版的《教育法》第 33 条规定老挝语和老挝文是国家各级教育体系中使用

的官方语言。该法奠定了老挝语作为教育体系中教学语言的官方地位。

在实行将老挝语作为官方标准语的单语制语言政策过程中, 外语教育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视。按照 1976 年国家课程大纲要求, 尽管小学教育中未设立外语课程, 法语和英语均属中学教育阶段外语课程, 其中法语作为第一外语。1994 年新版国家课程大纲中同样保留了小学阶段不学外语的政策, 但在中学阶段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外语科目, 比如俄语、越南语等。直至 2000 年, 《教育法》中规定小学三年级开始学习外语, 且外语在中学教育中仍属一门重要的基础科目。由于历史、地理和语言起源等原因, 泰语是对老挝人影响最深的一门外语。但由于历史上去暹罗化政策和当今培养老挝民族意识的需要, 泰语的深远影响并未得到老挝官方的承认, 甚至在 1990 年前在老挝境内禁止泰文出版物。由于老挝语和泰语同属于壮侗语族、壮傣语支, 二者的相似性导致老挝人并不认为泰语是一门外语。据 21 世纪初的调查, 90% 以上的万象人能听懂泰语, 30% 以上的会说、写泰语[21]。

然而, 无论在 1976、1994 年全国课程大纲中, 还是在 1991、2003 年《宪法》中, 亦或在 2000、2007 年《教育法》中, 均未提及将少数民族语言作为教学语言使用或作为语言学科学习。1994 年, 老挝文化研究所 (Culture Institute) 出版了《克木-老字典》。《克木-老字典》中列出了六千多个克木语词条, 但当年仅印发 500 本。

单语制的语言政策引起了一些少数民族群体的反对, 其带来的阻力使得老挝政府对少数民族语言政策有所调整。国家电台中提供克木语和苗语的节目, 也允许各地方电台提供少数民族语言节目。第六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规划 (2006-2010)”中提出了加强促进使用少数民族语言的重要性。“规划”指出要提高保护和推广各民族文化价值和传统的意识、维护和发展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字、在存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地区开展少数民族语言教育。第七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规划 (2011-2015)”中提出要在少数民族地区提供克木语和苗语版的法律法规, 以提高少数民族群体对法律的认识。《克木-老字典》也于 2018 年得到再版。

5 讨论与总结

本文基于 Lo Bianco 和 Aliani 提出的研究语言政策的三维度模型梳理了老挝四个不同历史时期的语言

政策: 澜沧王国和暹罗属国时期、法国殖民时期、君主制国家时期和社会主义国家时期。

由于澜沧王国和暹罗属国时期历史久远, 现有文献中鲜有对当时语言政策相关“文件”及“话语”的介绍, 仅能从历史的角度探讨当时的语言“实践”: 多数学者认为, 原始老挝语可能与中国南方历史上的百越民族的越语相近。老挝文字是在梵文和巴利文的基础上创造的拼音文字, 但在当时文字并未统一: 宗教场所使用源于巴利文的文字, 民间使用源于梵文的世俗文字。暹罗对老挝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统治期间, 大量泰语词汇进入老挝语中, 造成了当今老挝语和泰语高度相近的现象。

法国殖民期间, 在“文件”方面颁布了《老挝王国宪法》, 规定法语为官方语言、老挝语为国语; 以及王室 67 号法令和 1949 年法令, 以此为据删除了老挝语中源于梵文和巴利文的词汇、简化老挝语拼写体系。此外, 法殖民当局意在対老挝语进行标准化和规范化: 组织专门委员会编写老挝语教材、设立尚塔博伊佛教研究委员会编写《老挝语语法》、法国传教士编纂了《老法词典》等。在“话语”和“实践”方面, 《老挝语语法》并未得到法殖民当局的赞同[21], 其语法体系较为复杂, 没有在老挝语中得到应用, 也没有得到广大老挝人的认可。简化的老挝语书写体系也没有被广泛接受。《老挝王国宪法》保证了法语在老挝作为官方语言、教学语言的地位。这期间, 老挝语也吸收了一些法语词汇。

法国殖民期间的语言政策可以总结为语言同化、规范化和去暹罗化。从 1893 年法国殖民老挝直至 1954 年法国撤出老挝、老挝王国独立, 法语一直是老挝的官方语言、工作语言和教学语言, 而老挝语在教育体系中作为选修课程。殖民期间, 法当局推广法语的同时, 为了维护其殖民统治、割裂老挝与暹罗的文化、语言关联, 多次制定了规范化老挝语的语言政策, 培养区别于暹罗的老挝民族意识。由于各种复杂原因, 其规范化进程并不顺利, 但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现代老挝语的形成。

君主制国家时期, 在“文件”方面, 《1957 年老挝王国宪法》规定老挝语为官方语言和教学语言; 《1962 年教育法令》允许少数民族地区使用少数民族语言作为教学语言。“话语”方面, Enfield [26] 认为《1962 年教育法令》是老挝历史上第一部兼顾老挝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的政策文件。“实践”方面, 老挝官方语言的转变并非一蹴而就: 直到 1972 年, 法语版的国家法律文件才被翻译成老挝语。此外, 王室政府在操作层面并没有

给予少数民族语言足够重视,而是巴特寮政府在解放区引入了苗语和克木语教材。

从老挝王国正式独立到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成立的20年间,老挝的语言政策属于过渡时期。老挝王国政府基本延续了法国殖民时期“老挝语言文字委员会”制定的语言教育政策和老挝语拼写规则。此外,老挝王国政府在美国的支持、推动下在一定程度上推广了英语。巴特寮政府在解放区对老挝语删繁就简、并编写新版《老挝语语法》,进一步促进了语言文字的统一和老挝语的普及。同时,巴特寮政府还重视少数民族语言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使用。

社会主义国家初期老挝的语言政策可以总结为单语制语言政策。在“文件”方面,《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宪法》和《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教育法》规定老挝语为国家官方语言、通用语言和教学语言。“话语”方面,尽管单语制语言政策意在培养老挝民族意识、构建国家认同,但这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其他少数民族的反对,尤其是人口众多的克木族和苗族。随后,在完成上述历史使命的同时,老挝政府对单语制政策逐步改良,调整少数民族语言政策。“实践”方面,国家电台开始提供苗语和克木语节目,也允许地方电台提供少数民族语言节目;国家法律法规文件也被翻译成少数民族语言;2018年《克木-老字典》的再版也是调整少数民族语言政策的一种表现。当今的老挝语言政策可以总结为单语制为主、同时推行多语并存的语言政策。

本文尝试运用 Lo Bianco 和 Aliani 提出的研究语言政策的三维度模型分析梳理老挝历代语言政策。相比于国内现有相关研究,本文对老挝语言政策做了相对更加真实、详实的梳理和总结:对于法国殖民时期的老挝语言政策,相比于现有文献中提出的“语言同化和规范化”的政策,本文通过梳理一手外文文献,首次完善提出了“语言同化、规范化和去暹罗化”的语言政策。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老挝语言政策,相比于现有文献中提出的“单语制语言政策”,本文提出了更为完善的“单语制为主、同时推行多语并存的语言政策”。Lo Bianco 和 Aliani 的语言政策三维度模型自提出后已成为语言政策与规划领域的重要理论之一,并在国际文献中被经常引用[29-32]。国内中文文献中鲜有运用该理论模型解释语言政策,本文在一定程度上算是对该模型的一种“引进”。然而该模型被主要应用于解释英语国家的语言政策,对于亚洲国家——尤其是东南亚国家——的语言政策的解释力如何,还需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 [1] 王军,李峰,元利兴.可把老挝作为“一带一路”战略突破口 [N]. 上海证券报,2015-4月1日.
- [2] 李宇明.“一带一路”需要语言铺路 [J]. 中国科技语, 2015, 17 (06): 62.
- [3] 杨洋,晏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状况探析:问题与对策 [J]. 社会科学前沿, 2022, (07): 2857-2865.
- [4] 张良民. 老挝文字演变史初探 [J]. 印支研究, 1983, (03): 33-35.
- [5] 尹少君,零宏惠. 老挝语言政策探微 [J].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4, (03): 365-366.
- [6] STUART-FOX M.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Laos [M]. Scarecrow Press, 2008.
- [7] 黄素芳. 现代老语的形成与老挝的语言政策 [J]. 东南亚, 2003, (03): 46-48+39.
- [8] 温荣刚. 美国因素和1962年《日内瓦协议》以后老挝内战的重启 [J]. 南洋问题研究, 2013, (03): 19-24.
- [9] 许红艳. 老挝的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 [J]. 曲靖师范学院学报, 2010, 29 (02): 90-95.
- [10] 周建新. 老挝的民族识别与划分及其未来发展 [J]. 贵州民族研究, 2001, (01): 150-156.
- [11] (越南)黎巨捻著,范宏贵译. 现今老挝的民族分布 [J]. 广西民族研究, 1992, (增刊).
- [12] LAO STATISTIC BUREAU. Lao Population and Housing Census [M]. Vientiane, 2015.
- [13] BENEDICT P K.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of Indochina [J].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47, 6 (4): 379-389.
- [14] BIANCO J L, ALIANI R. Language planning and student experiences: Intention, rhetoric and implementation [M]. Multilingual matters, 2013.
- [15] MEYERS C. Lao language policy [M]//KIRKPATRICK A, LIDDICOAT A J. The Routledge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y in Asia. New York; Routledge. 2019: 203-215.
- [16] 温科秋. 老挝的多语现象与语言政策 [J]. 东南亚纵横, 2010, (01): 64-68.
- [17] 郑淑花. 从殖民地语言政策到民族独立的语言政策——老挝语言政策研究 [J]. 广西教育学院学报, 2004, (06): 135-137.
- [18] IVARSSON S. Towards a new Laos: Lao Nhay and the campaign for a national 're-awakening' in Laos 1941-45 [M]//EVANS G. Laos: Culture and Society. Chiang Mai; Silkworm Press. 1999: 61-78.

- [19] KHAMPAO P. Education during 1893 - 1975 [M]//SOMLIT B, KHAMPAO P, OUDOM C, et al. History of Lao Education. Vientiane; Toyota Foundation. 1996: 20-89.
- [20] NOONAN R. US aid to education in Laos, 1955-1975: A contribution to historical comparative education, embedded in time and space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Education (JICE), 2014, 3 (1): 153-169.
- [21] 林菱. 泰国和老挝语言政策比较 [J]. 四川民族学院学报, 2016, 25 (03): 56-60.
- [22] 闫亚平, 张丽萍. 老挝语言教育政策探观 [J]. 北部湾大学学报, 2019, 34 (08): 49-54.
- [23] KEYES C F. The politics of language in Thailand and Laos [M]//BROWN M E, GANGULY S. Fighting Words: Language Policy and Ethnic Relations in Asia. Cambridge; MIT Press. 2003: 177-210.
- [24] DJITÉ P G. The language difference: Language and development in the Greater Mekong sub-region [M]. Multilingual Matters, 2011.
- [25] 王辉. “一带一路”国家语言状况与语言政策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 [26] ENFIELD N J. Lao as a national language [M]//EVANS G. Laos: Culture and Society. Chiang Mai; Silkworm Press. 1999: 258-290.
- [27] NOONAN R. Notes on the education reform of 1962 [J].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Laos Working Paper Series, 2012, (7): 1-50.
- [28] 陆蕴联. 浅析老挝文字的历史渊源 [J]. 东南亚纵横, 2007, (03): 53-58.
- [29] SCARINO A. Situating the challenges in current languages education policy in Australia—unlearning monolingualism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ultilingualism, 2014, 11 (3): 289-306.
- [30] GIL J. 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i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KIRKPATRICK R. 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y in Asia. Heidelberg, New York, Dordrecht, London; Springer Cham. 2016: 49-90.
- [31] HAMID M O, KIRKPATRICK A. Foreign language policies in Asia and Australia in the Asian century [J]. Language Problems and Language Planning, 2016, 40 (1): 26-46.
- [32] CARUSO M, FRASCHINI N. AQ methodology study into vision of Italian L2 university students: An Australian perspective [J].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2021, 105 (2): 552-568.